

试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工合”运动的关系

谢荣斌 张全省

(宝鸡文理学院)

摘要 抗日战争时期的“工合”运动,自始至终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指导、帮助,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迅速发展,取得了重要成果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抗日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工合”运动发展的历史,就是与中国共产党相互支持,共同推动,积极合作的历史。

关键词 抗日战争 中国共产党 工合运动

抗日战争开始后,在同情中国的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夫妇、路易·艾黎、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科尔及我国爱国进步人士胡愈之、萨空了、徐新六等人的倡导和推动下,随着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汉口的正式成立,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掀起了一场以争取国际援助为重要途径,以创办工业合作社为主要形式,以组织难民开展生产自救,支援抗日战争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即“工合”运动。这场酝酿于上海,形成于武汉,结果于宝鸡及全国许多地区的经济救亡运动,自始至终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指导、帮助,对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及最后胜利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支持“工合”事业并帮助其制定发展政策,是“工合”运动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重要保证。中国共产党人对“工合”事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积极的态度。1938年5月,“工合”倡导者埃德加·斯诺和上海银行行长徐新六将起草好的“工合”发展规划送到当时的抗战中心汉口时,首先见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立即得到周恩来的积极支持。这年六月初,起草“工合”计划的召集人路易·艾黎到汉口后又找到周恩来和博古。当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诺就着手成立的“工合”组织的性质和人事安排等问题和周恩来商量时,周恩来明确指出: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工合”一定要同国民党政权配合,但要保持自己社会团体的面貌,使“工合”成为一个群众性的组织。关于参加“工合”组织的领导成员,周恩来认为,最好能吸收在群众中有一定威望的爱国民主人士,这样可使“工合”不致发展成一个官僚机构。周恩来的这些建议,对艾黎推荐“工合”总会的领导班子有很大的启发。“工合”工作开始之际,困难重重,问题很多,周恩来总是鼓励艾黎克服困难和阻力,将“工合”工作进行下去。博古也多次主动看望艾黎,和他研究有关问题,帮助其制定政策,并向艾黎明确指出:“工合”的主要任务必须是发展生产以促使蒋介石抗战,不让他投降。尽可能

多地争取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支持。因为国民党特别对于来自美国的任何事物都很敏感。八路军办事处的王炳南也一直鼓励和帮助艾黎，为推艾黎进“工合”献计献策。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汉口成立时，中国共产党人林祖涵、董必武、邓颖超又欣然受聘担任工合理事会理事。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全力支持，帮助其制定政策，保证了“工合”运动发展的正确方向，使“工合”运动不仅在国统区而且在解放区迅速发展起来。

其次，中国共产党人对“工合”工作的热情鼓励，具体指导，是“工合”运动克服困难，顺利发展的重要条件。共产党人对“工合”运动的积极支持，促使路易·艾黎进一步密切和共产党人的关系。1939年至1941年，为拓展“工合”工作，艾黎两次到延安。第一次是参加延安“工合”产品展览会，第二次是去榆林建立“工合”事务所。毛泽东亲切接见了艾黎。艾黎向毛泽东汇报了“工合”的发展情况。当时，“工合”问题很多，经费短缺，发展困难，而国民党官员还企图从中渔利，阻挠甚至破坏。毛泽东鼓励艾黎坚持战斗下去，这给艾黎以极大的鼓舞。艾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建议，从延安回到凤县双石铺后即下定决心，在柏家坪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学校取名“培黎”，一为纪念曾任南京金陵大学教授，在中国长期从事教育事业的美国友人约瑟夫·培黎，二是取意“为黎明而培训”。艾黎要把凤县双石铺作为“工合”的一个培训中心，在努力为“工合”培训领导和技术骨干的同时，也为未来的新中国培养技术人才。为了进一步推进“工合”事业发展，支援长期抗战，毛泽东在1940年初时，特意从延安派了刘鼎、陈康伯、黎雪、赵一峰几位同志到宝鸡和双石铺，帮助艾黎研究西北“工合”发展计划。这些同志通过调查了解“工合”工作，向艾黎提出一定要依靠群众，坚持民主办社，同时鉴于当时形势，尤其是宝鸡、双石铺地处川陕甘交通要道，将来日军西进，这里可作为游击区的根据地，建议在当地发展一些重要的基础工业。这些建议对艾黎及“工合”工作启发很大，为西北“工合”运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指明了方向。西北“工合”随之建立了当时在西北区唯一的双石铺机器厂，不仅能制造织袜机、缝纫机、织背心机、机器钢磨，还能制造手枪、步枪，如日军西进潼关，将转为兵工厂，配合游击战争。1943年到1944年，周恩来、邓颖超从重庆往返延安、西安途中，两次路过凤县双石铺，在“工合”招待所居住停留时，又前往柏家坪艾黎住地，和他促膝交谈，共商“工合”发展大计，对“工合”工作给予具体的指导。抗战后期，国民党反动派经常破坏各地“工会”运动，尤其在西北办事处，先后有18名“工合”妇女工作人员被捕到西安集中营。艾黎和热心“工合”事业的乔治·何克被定为亲共危险分子，培黎工艺学校受到特务监视和破坏，艾黎感到“不可能再在秦岭的双石铺工作下去了”，便征求周恩来的意见，1944年秋，经周恩来同意，艾黎将培黎工艺学校迁到甘肃山丹县，使“工合”的这个人才摇篮保存了下来。

再次，中国共产党人注重加强对“工合”工作及基层组织的领导，是“工合”迅速发展，取得巨大成果的关键因素。1938年9月，“工合”运动刚刚开始，中共陕西省委就派地下党员郑长家到“工合”西北办事处宝鸡事务所当主任，地下党员柳文到事务所做妇女工作。在“工合”的西北、西南、东南及后来成立的晋豫、浙皖等各地办事处及事务所，大批共产党员在其中活动，许多人担任了领导职务。比如共产党员孟用潜和孟受

曾受贺龙和叶挺指派在艾黎推荐下，分别担任了“工合”晋豫区和浙皖区办事处主任。在对群众的抗日宣传对社员的教育，妇女教育，过境伤兵的救护，组织社员努力生产，支援前线及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过程中，共产党员都发挥了先锋骨干作用，从而使“工合”运动不仅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开展起来，而且冲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压迫阻挠破坏，不断发展壮大，取得了重大成果。比如“工合”西北办事处，1938年8月下旬成立时，主任及同仁不过二三人，但到1940年就建立起宝鸡、西安、双石铺、凤翔、汉中、镇安、延安、兰州等事务所17个，造纸、铁器、机械、铸造、纺纱、制鞋等各种工业合作社557个。后期更发展到拥有2000多个工业合作社，安置失业工人20多万人。以西北“工合”为主，各地“工合”抗战期间总共生产军毯“不下五百万条”^①各种工业合作社，不仅能生产一般的民用品，而且能生产手枪、步枪、手榴弹等军用产品。中国“工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合作运动的先驱”。它在支援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日的同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解放区的抗日斗争也给予了有力支援。

第一，国统区的“工合”组织尽力为八路军、新四军生产和提供物资，解决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急需。1939年，宋庆龄曾一次委托以宝鸡为中心的西北“工合”承制棉衣10万件。当时宝鸡、西安等地的纺织、服装“工合”战士，满怀抗日激情，提出“赶制万件棉衣，换取敌人万颗头颅”的口号，克服困难，夜以继日地迅速赶制出来，打包运送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转运前方将士。同年西北“工合”为响应宋庆龄为新四军伤病员捐赠“二万条毛毯运动”，在12月又由宝鸡一地的“工合”迅速生产军毯5万条，军大衣36000件，送往前方，拯救了大批新四军伤病员的生命。国统区“工合”的及时援助，解决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当务之急。

第二，“工合”总会还根据需要在解放区设立工合事务所，并将一些生产军需物资的合作社迁到解放区，发展了根据地的经济，增强了敌后军民的战斗力。“工合”组织不仅努力为八路军、新四军提供急需物品，还在解放区设立事务所，并对原有四个地区办事处进行调整，使“工合”能更好为解放区服务。1939年初，西北“工合”设立了延安事务所，短短几个月，延安就建立了15个工业合作社。同年下半年，又在解放区设立第二个工合事务所即晋东南事务所，极大地推动了解放区“工合”运动的发展。1940年到1941年，随着抗战及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工合”总会又对原有的四个办事处进行了调整，增设了晋豫区、浙皖区两个办事处，原西南区改为湘桂和滇黔两个区办事处。“成立晋豫和浙皖两个区办事处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工合”在解放区的工作”。^②这两个区办事处主任由艾黎推荐的两名共产党员担任。同时，“工合”还根据需要，将一些生产军需物资的合作社迁到解放区。比如1939年艾黎到延安，从毛泽东那儿得知在晋西北的贺龙部队缺乏制造手榴弹的铁料时，就想办法把晋东南的一个冶铁合作社迁到那里，帮助八路军制造手榴弹等军需产品。对在华中坚持抗日斗争的四新军，“工合”同样给予极大帮助。“工合”浙皖区办事处利用距皖南新四军驻地较近的有利条件，主动同新四军联系，要求新四军派人参加“工合”工作，为此，新四军政治部先后派了叶建明，侯尉文、蒋传源前往工作。使新四军和“工合”的联系进一步密切。1939年，他们更是在新四军根据地中心泾县茂林镇建立了泾太（泾县和太平县）事务

所，尔后七八个月中，茂林地区先后办起了造纸、制鞋、缝纫、烧碱、竹器等十多个合作社。生产的产品主要供新四军急用。如造纸合作社生产的纸张供新四军印刷《抗敌报》和文件之用，从而打破了敌人对新四军的重重经济封锁，使新四军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坚持长期抗日斗争。

第三，“工合”也积极为八路军、新四军争取国际援助。当时国民党政府虽然拨给工合总会一部分贷款基金，但绝大部分用在国统区的工业合作社，对解放区“工合”的贷款，国民党政府千方百计加以限制阻挠。1939年底，由于设在重庆的“工合”总会不再提供援助，延安的工合组织几近破产。在此关键时刻，设在香港的以宋庆龄为名誉主席，以香港英国主教何明华为主席的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向解放区伸出援助之手。他们排除国民党的干扰，以各种方式支援解放区。仅1940年初，这个委员会就把马尼拉华侨的捐款10万元一次拨给陕甘宁边区“工合”，解决了边区“工合”发展的燃眉之急。此后，边区及敌后根据地的“工合”主要依靠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提供的国外援助的资金来维持。珍珠港事件之前，菲律宾和南洋华侨筹集了100多万元支持边区的“工合”。为防止国民党窃取捐赠中国“工合”的捐款，香港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责成该会执行秘书陈翰笙经由上海银行，通过廖承志和唐明照把捐款直接转延安交李富春。^③香港沦陷后，工合国际委员会又经过在宝鸡的西北办事处向延安及解放区转送了大批援款和器材。由于工合国际委员会的援助，加上边区政府的重视，解放区的“工合”事业蓬勃发展，工业合作社的生产能力不断提高。1940年，延安办起了新华造纸厂，桥儿沟化学厂、毛纺厂，自然科学院，技术学校和光华农场及18个供销合作社。到1942年9月底，延安地区各种工业合作社已发展到41个，社员达1041名，入股资金已从1941年的669314元法币，增加到了3434040元。“工合”每月生产：羊毛毯270条，棉毯600条，粗布2466包，毛袜毛鞋1325双，毛帽1500顶，肥皂30000条，牙粉16796包，面粉3250市斤，豆粉1400磅，酒精605磅，植物油6000磅，盐3888磅，墨水5250瓶。^④“工合”的这些产品丰富了边区军民的需要，补充了公营经济的不足，缓解了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随着“工合”经营范围的扩大，边区“工合”有了铁矿，煤矿、铁工厂，小机器制造厂，制药厂，运输站和两个油井。而延安的“工合”机构亦成为全国最大的地区总分会，拥有工人相当于中国其他地区“工合”工人的总合。直接为八路军服务的延安“工合”军需厂，成为全国最大的工厂。陕甘宁边区及其他各个抗日根据地“工合”事业的发展，对根据地经济建设及敌后军民坚持持久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对此毛泽东曾指出：“在华北游击区和西北接近战区的地方组织建立这种工业合作社，对我们的斗争贡献之大，将是不可估量的”。1940年新四军军长叶挺亦曾专门写信给“工合”国际委员会表示：“我们衷心感谢你们经常捐赠和帮助皖南游击区建立工业合作社。……这些工业使我们区里的难民得以生产自救。它们帮助我们利用本地的原料，使不致落于敌人之手。因此我们能够抵挡敌人货物之侵入，并有可能自给自足，使皖南人民得到好处。”^⑤这是对“工合”运动在解放区开展对中国共产党坚持敌后持久抗战发挥重要作用的最好评价和充分肯定。

“工合”运动发展的历史就是与中国共产党互相支持，积极合作，共同推动的历史
(下转第16页)

应该指出，儒家要人们在社会中“经世济民”、实现自己、成就自己，在封建的社会制度下，必然有为当时的生产关系服务、为自己争得显名并力图光宗耀祖的消极的一面。但千百年来，儒家的教诲及身体力行却从根本的意义上积淀为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强烈的忧国忧民的心态和历史的责任感、使命感、成就感。具体地说，儒家要人们关注他人、民众的幸福。要甚于关注个人的幸福。孔子曾讲：“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①孟子也说：“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②这样一种不怕艰难、忍辱负重、为人世造福、死而后已的做人的教诲曾不断地为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所践履。儒家的这种将个人的生命融汇在民众生命的海洋之中，并要人在其中立德、立功、立言而获得永恒与不朽的人生哲学，应该为现代的中国人所汲取和弘扬。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均出自《论语》。⑥④②③②出自《孟子》。⑦《周易大传·彖传》。⑧《荀子》。⑨《左传·襄公二十四年》。⑩《尚书·无逸》。⑪张载《正蒙·诚明》。⑫张载《西铭》。

（上接第40页）

史。中国共产党人的全力支持指导帮助是“工合”运动健康发展并取得重大成果的重要条件，而“工合”运动对敌后军民的抗日斗争亦给予了无私巨大的援助。“工合”运动由国际友人倡导，中外进步人士共同推进，其目的是为了争取国际援助，发展生产自救，支援抗日战争，所以它是一场经济领域的救亡运动。同时，“工合”的倡导者、组织者，主张“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希望开展工合运动以“建立平等的经济、民主的政治”^①。因此，它也是一场要求抗日民主政治的社会改良运动。中国共产党人对这场具有经济救亡和社会政治改良双重性质的“工合”运动所以持支持的态度，主要是它产生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它的开展有利于抗日，有利于社会进步，也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抗日战争时期的“工合”运动虽已成为历史，但研究“工合”运动以及它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关系，对于我们借鉴“工合”的历史经验，争取和利用外资，发展地区合作经济，搞好职业技术培训以及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坚持党的领导，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 ①陈翰笙《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过去及将来》第16页。（太平洋学会美国分会出版）。
②卢广锦《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第122页。
③路易·艾黎《工合运动记述》。
④保卫《中国同盟报告》英文版，1943年重庆。
⑤路易·艾黎《保卫中国同盟与“工合”艾黎永远和党在一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7页。
⑥《凤县志·民国时期资料汇编》，第177页。

（责任编辑：罗浩波）